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

泰戈尔研究文集

রবীন্দ্রনাথ সম্ক্রান্ত গবেষণামূলক রচনাবলি

魏丽明 编选



译林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泰戈尔研究文集

রবীন্দ্রনাথ সঙ্ক্রান্ত গবেষণামূলক রচনাবলি

魏丽明 编选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研究文集 / 魏丽明编选.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2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8063-6

Ⅰ.①泰… Ⅱ.①魏… Ⅲ.①泰戈尔(Tagore, Rabindranath 1861～1941)－人物研究－文集 ②泰戈尔(Tagore, Rabindranath 1861～1941)－文学研究－文集
Ⅳ.①K833.515.6-53 ②I351.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88606 号

泰戈尔研究文集　魏丽明 / 编选

责任编辑　王　玥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8063-6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

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 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一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失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模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二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传承和丰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二为方针”。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由二十二部学术史研究专著、二十二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辑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辑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

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第三辑涵盖陀思妥耶夫斯基、乔叟、简·奥斯丁、普鲁斯特、泰戈尔和希伯来经典。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

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绝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模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

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目录

从地缘文明透镜看“RUBI 兄”与“SUSIMA”之间的心传 …… 1
谭中

共同体、民族与可持续性：泰戈尔并未过时 …… 44
杜赞奇

歌手的“春风语流莺” …… 67
伊普喜妲·钱达

泰戈尔对东方的宏伟愿景 …… 84
阿弥雅·德武

泰戈尔与巴乌尔文化 …… 95
阿布尔·阿赫桑·乔杜里

泰戈尔在东南亚 …… 111
杜秋霞

泰戈尔在俄语世界 …… 138
谢尔盖·谢列布里亚尼

泰戈尔在罗马尼亚 …… 156
李维尤·博尔达斯

泰戈尔在保加利亚 …… 179
尼古拉·尼古拉耶夫

泰戈尔在南斯拉夫及其继承国 …… 190
安娜·杰尔妮卡娅

泰戈尔在拉脱维亚 …… 205
维克托·伊弗布里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泰戈尔在美国的接受情况 …… 216
安娜·费尔

帝国影子下的友谊：
1913—1932 年间泰戈尔在芝加哥的接受 …… 227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

从地缘文明透镜看“RUBI兄”与“SUSIMA”之间的心传

作者　[美国]谭中

泰戈尔众多的国际友人中，中国人极少。这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泰戈尔只在1924年访华一次，如果不算他1929年在上海Susima夫妇家做客那次的话。另一原因是语言障碍。语言是跨文化交往的必要便利条件。中国语文和印度语言体系差异极大，从来就妨碍着中印两大文明之间亲密交往。这并不是说语言的障碍不能克服。许多著名印度高僧，如鸠摩罗什、菩提流志等人在中国定居，中文非常流利。可是他们却没有回到印度去扩展中印文化交流运动。也有许多中国高僧，如玄奘与义净，去到印度，精通了梵文与印度方言，但他们没有留在印度使得中印文化交流运动长期持续。

泰戈尔1924年“唯一”的一次访华有许多特点。其一是他得到“竺震旦”的中文名字，这使他晚年感到愉快。他在过最后一次生日时突然心血来潮，回忆起1924年访华时在中国度过的六十三岁生日，作诗说：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大地，
……
我着了长衫，接受了中文名字。
我心中明白：
有了友谊就使我再世。

其二是他出于极大的亲密与好感，为一位中国诗人取了孟加拉名字

"Susima"。这件事更发展成中印友谊的历史佳话——是两位诗人，不，是两位兄弟诗人之间的故事："Rubi 兄"与"Susima"。泰戈尔访华后在印度出版了《在中国的讲话》(*Talks in China*)，在首页亲笔签名"献给友人 Susima"。这"Susima"是谁，他和泰戈尔亲密到什么程度，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一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中国有三个新潮的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三个组织都在中国认真发展新文学的运动。在中国这个两千年来有着辉煌文学成就的国度里，由于文学体系背上过时的包袱而阻碍了现代化进程。我们通常用"文言八股"来形容这过时的文学体系。第一，它和普通老百姓之间沟通的语言工具有些格格不入；第二，它不能掌握世界发展的旋律。这三个文学团体以及以后陆续出现的其他组织都是中国改造这有害的文学环境的急先锋，致力于创造一种新式思想联络与精神交往的方式。

这第三个团体"新月社"中有胡适 (1891—1962)、闻一多 (1899—1946)、梁实秋 (1903—1987) 等出色人物，但它的主要推动者是徐志摩 (1897—1931)——是国际大学泰戈尔博物馆 Rabindra-Bhavana 档案中的"Shu Tsemou"或者"Hsu Tsemou"。"新月社"是 1923 年在北京成立的，那时正处在准备欢迎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访华的兴奋之中。它在中国"白话诗"的诞生中起了接生婆的作用。它在 1933 年解散，实际上在 1931 年徐志摩急逝后就失去了生命力。

当我们看到这个团体选择"新月"这一名字时，马上就会联想到泰戈尔于 1913 年出版的《新月：儿童诗集》(*The Crescent Moon: Child Poems*)，这本书也是和泰戈尔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吉檀迦利》(*Gitanjali*) 齐名的，在中国比《吉檀迦利》更受读者欢迎。虽然有人认为"新月社"名字不是出于《新月：儿童诗集》，但如果我们探讨徐志摩对泰戈尔的深刻爱慕及泰戈尔访华对徐志摩的思想的巨大影响就可以忽视并拒绝这种异议。

据一个报道，1924 年 5 月 8 日，在北京东单三条的协和小礼堂里，人

们在彩排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徐志摩在剑桥热爱过的林徽因是剧中的女主角，背景中有月夜的景致。知名作家李伶伶认为这是新月社成立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彩排是为了次日在北京庆祝泰戈尔六十三岁生日的大会上的演出。泰戈尔看了年轻可爱的林徽因说英语主演《齐德拉》片段，非常感动，还上台去拥抱了她。林徽因又是徐志摩的翻译助手，跟徐志摩一样与泰戈尔形影不离。泰戈尔又得知徐志摩和林徽因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遭遇（有一种说法是徐志摩请泰戈尔劝阻林徽因别和梁思成结婚），最后泰戈尔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用孟加拉语念出两句诗，译成中文变成：

>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

有趣的是，一本较新的、广为传阅的泰戈尔传记对这一逸事做了曲线报道说：林（徽因）小姐，（泰戈尔）年轻可爱的翻译，花枝招展地跟在诗人（泰戈尔）身边。泰戈尔后来在两句诗中这样告诉她：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这一报道差点没捏造出莫须有的桃色新闻了。西方学术界这种“黄色”倾向不可取，但也看出泰戈尔和他的年轻翻译之间的深厚友情了。

其实，泰戈尔访华是徐志摩发起的，是1923年初他和自愿为泰戈尔秘书的英国人恩厚之（Leonard Elmhirst，徐的旧相识）在北京会见时决定的。泰戈尔的访问原定于1923年10月，但因泰戈尔身体不适而延迟到1924年4月才开始。徐志摩获得了在中国威望颇高的知识界领袖梁启超的大力支持，梁主掌的讲学会成为泰戈尔访华的正式东道主，还有别的团体赞助。泰戈尔访华时，徐志摩既是东道主，又是向导，又是翻译。他从泰戈尔在上海登陆时迎接了他以后就负责安排他和随行人员的住宿和行程。泰戈尔结束访华，徐志摩又按照中国传统送客一段，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又陪同泰戈尔从日本回到香港，一直到泰戈尔从香港乘船回国时才告别。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现在发现，泰戈尔在日本和恩厚之告别而由日本乘船去了上海。那就是说，泰戈尔和徐志摩又一同从日本回到上海，又一同从上海乘船去香港。这一切很可能是徐志

摩安排的。很明显，在这一过程中，泰戈尔与徐志摩变得特别亲密，泰戈尔为徐志摩起了孟加拉名字“Susima”，就开始这样称呼他，不再用“Shu Tsemou”或“Hsu Tsemou”了。徐志摩也称泰戈尔为“Rubi 兄”（孟加拉语是“Rubida”或者“Rubidada”，徐志摩写成“Rubidadda”）。[1]

徐志摩是个多才多艺又多情的中国知识分子。1918 年，他去美国攻读银行学。1921 年从美国去英国住了两年，1923 年回国。他在英国时，主要是在剑桥大学学政治经济学，也受到英国的浪漫派诗人影响。正是在这一期间，他变成泰戈尔的仰慕者。他在 1923 年促成了泰戈尔访华事宜后极为高兴。他于 7 月 26 日写信给泰戈尔说：“我已答应了讲学社，在您逗留中国期间充任您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份莫大的殊荣。……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他越写越感到兴奋：“我算是替您做讲台翻译的人。但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若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移译为文字了！”[2]

徐志摩在得知泰戈尔访华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后于 1923 年 12 月 27 日写了第二封信给泰戈尔。信中透露了中国在殷切盼望伟大印度诗人的到来。徐写道：“这里几乎所有的具有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您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您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有一种以上的译本。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您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3]

徐志摩本人成为媒体制造欢迎泰戈尔热烈气氛的急先锋。事实上是他在访华事件还在酝酿时首先就公开欢迎了。1923 年 7 月 6 日，他发表了《太戈尔来华》的文章说：

> 太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

1 徐志摩写信给泰戈尔，本来用“Dear Mr. Tagore”（亲爱的泰戈尔先生），后来改成“Dear Rubidadda”（亲爱的 Rubi 兄），参见《徐志摩全集 · 第六卷书信》，第 374—387 页。

2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 · 第六卷书信》，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76 页。

3 同上注，第 379 页。

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的答说太戈尔。在新诗界中……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很可惊的状况，一个外国的诗人，能（在中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现在他快到中国来了，在他青年的崇拜者听了，不消说当然是最可喜的消息，他们不仅天天竖耳企踵的在盼望，就是他们梦里的颜色，我猜想，也一定多增了几分妩媚。[1]

中国新诗“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受到泰戈尔“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1923年是很可能的，因为那时新诗的风气才刚刚启始，而泰戈尔在1913年作为第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中国文学爱好者中间造成的热度达到高峰，他的作品纷纷被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当然影响巨大。徐志摩自己处在新诗运动的前列，也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典范，他自己的诗中有泰戈尔的影响，别人仿效他的诗也就变成了他间接传播泰戈尔影响的过程。

在这篇文章中，徐志摩道出了“华族”的悲剧，那“春秋战国才智之盛”，还有那些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李白（701—762）、苏东坡（1037—1101）等著名诗人的光辉文化都消逝千余年了。徐志摩说中国人缅怀过去的荣耀，“要求一二位圣洁的人格”来使自己得到精神安慰。

这些话使我们对中国1924年热情欢迎泰戈尔有了充分认识。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那些被外界迅速变化唤醒的人们，一方面感到沮丧，另一方面又受到泰戈尔访华的鼓舞而增长了志气。这一神情反映在徐志摩写给泰戈尔的第二封信中：

您的影响使人们想到春回大地的光景——是忽尔而临的，也是光明璀璨的。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艳的蓓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您是风露之源，您的诗作替我们的思想与感情加添了颜色，也给我们的语言展示了新的远景，不然的话，中文就是一个苍白和僵化的混合体了。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您更能论证这一点的。这说明我们为什么这样

1 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一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